论经济犯罪的特点与对策

宫晓冰

经济犯罪这一日益突出的丑恶现象，如同附在社会肌体上的“癌细胞”，其危害之广、之深、之烈，越来越为人们痛心疾首。经济犯罪是社会诸多复杂因素的综合反映，重视并认真研究制定治理经济犯罪的整体对策，已经刻不容缓。

“经济犯罪”一词在我国的出现，是进入八十年代社会经济生活发展、变化的反映。我国《刑法》没有经济犯罪的提法，只是在分则第三章专列了“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秩序罪”，其具体罪名有走私、投机倒把、倒卖票证、偷税抗税、伪造货币等有价票证，伪造税票、货票、毁坏机器设备、残害耕畜等破坏集体生产、挪用、假冒商标、盗伐滥伐林木、破坏水产资源、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等十多种。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推行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刑法》第三章已经不能完整地概括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秩序的犯罪，如在经济犯罪中占有相当大比重的贪污、受贿罪，就未被《刑法》第三章所概括。《刑法》对各种经济类犯罪的量刑标准，亦因过轻而抵挡不住巨额经济利益对“蹈法者”的诱惑。鉴于这种情况，1982年3月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了《关于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的罪犯的决定》，正式启用了“经济犯罪”的概念，将经济犯罪的外延在《刑法》第三章的基础上，扩展到包括贪污、受贿、盗窃、贩毒、套汇、盗运珍贵文物等各种获取非法经济利益的犯罪，对这些罪犯也相应补充规定了给予较重的刑罚处罚。

近几年来，法学界对于经济犯罪问题的研究和著述不谓不多，但到目前，对于经济犯罪的概念尚未争论出比较统一的见解，这更增添这一社会问题的复杂色彩。纵观近十年来经济犯罪的发展概况，可以看出几个特点。

1. 经济犯罪总体上呈上升趋势。经济犯罪的实际发案数与经济罪案的立案数虽然不能等同，但在一个较长时期内，立案数的增减可以大致反映出发案数多少的趋势。从全国检察机关1979年至1988年所立经济罪案数，可窥见经济犯罪数上升的大致情况。1979年的立案数仅为几百件，其中万元以上大案数仅几件；1980年的立案数比1979年猛增了11倍，大案数猛增了14倍；1981年的立案数比1980年约增加了两倍，大案数增加约7倍；1982年的立案数比1981年增加约两倍，大案数增加近4倍。1983年和1984年的立案数和大案数都较1982年有所下降。1985年的立案数又开始回升，基本上与1982年的立案数相当，但大案数比82年增加了约2.5倍；1986年的立案数比1985年增加约1.7倍，大案数增加两倍强；1987年的立案数比1986年下降了约三分之一，大案数下降了二分之一强；1988年的立案数、大案数与1987年的数字大体持平。从十年经济犯罪案件的立案情况可看出，所立经济犯罪案数有两个高峰期，即82

年与86年两次“战役”性集中打击期间。每一次“战役”之后，都出现经济罪案立案数下降的情况。原因有二：（1）经过集中打击之后，经济犯罪活动有所收敛；（2）重新强调不要因打击经济犯罪而影响改革、开放的发展，司法机关“投鼠忌器”。尽管经济罪案立案数在短时期内有起有伏，但从十年的情况看，经济犯罪总体上呈上升趋势。

2.经济犯罪活动的涉及范围越来越广。近几年来，经济犯罪活动不仅存在于产、供、销各个环节，而且渗透到与之相关的各个部门，最为突出的有银行、税务、粮食、工商、铁路、物资、建筑、商业、出入境管理等部门；不仅渗透国内经济领域，而且渗透到涉外经济领域；不仅涉及供销经营管理人员，而且涉及党政干部和一些领导干部；犯罪主体不仅是自然人，而且扩大到相当数量的法人。

3.经济犯罪的危害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经济犯罪的最大特点是权钱交易。在金钱的引诱和驱使下，不少人丧失了原则和理智，将自己管辖下的一切方便之门对罪犯敞开。一些罪犯在自己的“胜利”中狂言：“没有金钱买不动的官，没有金钱打不通的关节”。重庆市一个“倒爷”曾公开对市长说：“你信不信，我可以用钱买通你手下的有关部门，倒出你现在最紧缺的物资。”一些罪犯前几年就扬言：“趁共产党还没有睡醒，现在能捞就要尽量捞。”流通领域内的商业贿赂犯罪，使得一些国营大中企业的优质产品寸步难行，而某些乡镇、个体企业的劣质产品却能行销全国。近几年来，经济犯罪的数额，已经令五十年代的“万字号大老虎”相形见拙。1979年破获的王守信重大贪污案，贪污数额还仅仅是五十余万元，到最近一、两年，贪污数额最高的已达上千万元。受贿金额几百万元的已不鲜见。经济犯罪的猖獗，不仅严重扰乱了社会的生产、流通秩序，而且严重破坏了各级政府有关部门的行政管理秩序。更有甚者，造成了人们的思想混乱，毒害了社会风气，严重影响和降低了党和政府在群众心目中的信誉。

4.经济犯罪手段多样化。为了逃避处罚，经济犯罪手段近几年不断翻新，方法多样。仅以行贿手段为例，就可以列出如下新变种：（1）为受贿人子女在国外留学提供经济条件；（2）以赌博方式故意输钱给受贿人；（3）赠送高档消费品附加发票；（4）提供无偿或低报酬劳务；（5）为受贿人或其直系亲属提供免费旅游条件；（6）以咨询费、信息费、介绍费等名目行贿；（7）转让商品房的使用权；（8）高价买进紧俏商品，平价卖给受贿人；（9）邀请受贿人出国“访问”、“考察”；（10）提供异性给受贿人玩弄，等等。近几年经济犯罪的新特点是，犯罪分子往往一人多罪，一案多人多罪，贪污、受贿、投机倒把罪往往交叉，且多上下勾结，内外勾结，共同犯罪增加。与几年前多是单个人作案的情况相比较，从个体道德沦丧向团体道德沦丧发展的趋势不言自明。

5.现行《刑法》的某些规定已经不能适应经济犯罪现象突出的新情况。由于1979年《刑法》的制订，所依据的是国家进入改革、开放前期的传统计划经济体制背景，就当时的经济犯罪及其对社会的危害性而言，尚未成为一个突出的社会问题，更谈不上成为一个影响党政机关廉洁形象的政治问题，因此，《刑法》在对犯罪分类、章节设置及对各种犯罪量刑轻重的规定上，不能不打上时代的烙印。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和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新体制的逐步确立，《刑法》关于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秩序罪的某些规定的不适应日渐突出，主要有：（1）经济犯罪分类不适应。目前公认的经济犯罪罪名，已经大大超出《刑法》分则第三章的范围，横跨“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秩序罪”、“侵犯财产罪”、“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和“渎职罪”四大类。而且出现了同一具体犯罪，同时侵犯两类客体的新情况，如贪污罪、受

贿罪，既侵犯了社会主义经济秩序，又侵犯了国家行政管理秩序。（2）犯罪主体的规定不适应。我国《刑法》规定作为犯罪主体的，只能是自然人，而现实生活中法人作为经济犯罪主体的情况已屡见不鲜。又如《刑法》规定作为受贿主体的，只能是利用职务之便的国家工作人员，而现实生活中出现了非国家工作人员利用他人的职务之便收受贿赂的新情况。（3）对经济犯罪规定的处罚过轻，起不到对犯罪分子的惩戒和一般预防作用。

二

经济犯罪问题的日益突出和对国家政治、经济、社会生活及人的思想造成的严重危害，使我们有必要从更高的层次来认识治理经济犯罪问题。以往的“战役”打击方式，可以收一时之效，但难保“长久平安”。这就需要从全社会的角度，制定一个与经济犯罪的发展相对应的社会整体治理对策。为此，应首先解决以下几个认识和实际问题：

1. 正确认识和处理好制订经济制度、政策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相统一的关系。国家和各级地方、各部门实施的经济制度、政策，在社会实践中能产生出什么样的物质产品，其数量、质量如何，固然是一个衡量的重要标准，但是，这种经济制度、政策的实施能够怎样地引导人的价值取向，塑造出什么素质的人，不能不是衡量这一经济制度、政策优劣的一个重要方面。即使就物质产品而言，作为物质高度发展的产物的人，也是居于首位的物质产品，是生产力要素中最为活跃的因素。如果国家制订、实施某种经济制度和政策，即使促进了物质产品的大量产出，但在另一方面亦起着引导、刺激并为经济犯罪提供条件的作用，就很难说这种经济制度、政策是成功的。作为国家和各级地方、各部门制订经济制度、政策所依据的，应该是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统一，应该是在追求社会的文明、道德进化和作为社会主体的人的素质提高的同时，促进社会物质产品的增长。这一点，对于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尤为重要。十年来打击经济犯罪的斗争之所以出现几起几伏，与从中央到地方各个层次和部门之间在经济制度、政策导向上的偏差不无关系，可谓“上面失之毫厘，下面谬以千里”。在我们以认真、严肃态度提出治理经济犯罪问题的时候，对此是不能回避和掩饰的。

2. 正确认识预防与制裁经济犯罪的关系。制裁是指对业已发生的经济犯罪案件及时侦破，对罪犯依法予以惩处。预防是指消除经济犯罪的主观诱发条件和客观利用条件，包括提高人对非法经济利益的“内心抵制诱惑力”和堵塞法律、政策、规章制度“漏洞”两个方面。制裁虽然同时具有“一般预防”的作用，但毕竟大量预防工作不是制裁所能代替的，因此需要各级党政领导的重视和各部门、行业的支持、配合。目前存在的问题是：一方面，某些党政领导和为数不少的部门、行业由于认识上的片面性，把治理经济犯罪看成是司法机关的事，司法机关只能孤军作战；另一方面，大多数司法机关疲于应付侦察、审理经济犯罪案件，少有精力分析、归纳经济犯罪的规律和存在条件，鲜能提出预防经济犯罪的建议，供各级党委、人大、政府和有关部门、行业参考，因而近几年来出现了对经济犯罪“边打边犯”，一些罪犯“顶风”作案的现象。

3. 正确认识改革、开放与预防、打击经济犯罪的关系。十年中存在制裁经济犯罪不力的现象，重要原因之一，是上上下下不同程度存在对改革、开放与预防、打击经济犯罪关系的模糊认识，认为“改革、开放条件下经济犯罪的增加不可避免”，“打击经济犯罪影响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等等。其实，任何改革都不是不要秩序，而是要以新秩序来代替旧秩序，改革、开放不可能没有限制和管理，而对于经济犯罪的预防和制裁，正是保证改革、

开放有秩序地进行和不偏离正确轨道的必要限制与管理。否则，难以想象在混乱的经济运行秩序、行政管理秩序下，会有效地保障改革、开放健康发展。当然，司法机关也应当严格区分正确与错误、罪与非罪、一般违法与犯罪的界限，正确行使手中的法律武器。

4. 正确处理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的关系。从理论上说，国家制订的法律、政策，体现了国家的整体利益和局部利益的一致，要求各地方、各部门必须一体遵行。地方、部门只能在不与国家法律、政策抵触的情况下，制订地方性和部门性的法规、政策。这些年来存在的问题是：一方面，一些地方、部门从自己的局部利益出发，不惜违反国家法律和政策，侵犯国家的整体利益，损大公利小公，一度时兴的“红灯绿灯论”即是其理论表现；另一方面，国家的某些政策也有对地方、部门利益的特殊性考虑不周的情况，使一些地方、部门为了完成国家指令性计划而不得不违背国家法律、政策，即所谓“逼良为娼”。要从根本上消除产生经济犯罪的根源，正确处理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的关系，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

5. 正确处理发案单位存在的实际问题。一些发案单位由于下列主、客观原因，对于司法机关查处经济犯罪案件持消极态度。（1）担心查出经济犯罪问题影响单位声誉，害怕评不上或保不住精神文明单位称号，因而对明显构成犯罪的問題也不向司法机关报告，有的单位甚至对司法机关的查处工作设置障碍。（2）对于一个企业来说，查出经济犯罪问题，会不同程度地暴露企业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有的企业害怕因此影响企业顺利通过升级的考核。（3）目前，某些地方的司法机关由于办案经费、车辆得不到保证，而将其转由发案单位负担。这对于发案单位来说，既已蒙受了经济犯罪造成的损失，还要承担配合办案的经济“损耗”，可谓双重受损。解决第（1）、（2）问题，有关负责评比考核工作的部门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和对待，对于确属单位、企业由于领导不重视、规章制度不健全而使罪犯得以作案的，当然不能入选“精神文明单位”和通过“企业升级”考核；对于进而阻碍查处经济犯罪的单位及领导人应予以相应的处理；对于纯属罪犯个人原因的经济犯罪案件，则不应影响单位、企业的各种评选，但应以单位积极支持和配合查处所发生的经济犯罪案件为前提。对于第（3）个问题，则应由地方政府实实在在地解决司法机关的办案经费和必要的物质条件，以解除发案单位不应承受的经济负担。

三

作为治理经济犯罪的整体对策，似应包括预防和制裁两个有效体系。

1. 有效的经济犯罪预防体系。建立有效的经济犯罪预防体系的总目标是：消除产生经济犯罪的主、客观条件，尽可能地减少经济犯罪给社会造成的危害。起码应包括以下五个方面：

（1）加强有效的思想政治工作和职业道德教育，增强人们抵御非法经济利益诱惑的“免疫力”，提高人的精神境界，形成一种崇尚廉洁、鄙弃和谴责经济犯罪的社会风气，使广大群众检举、揭发经济犯罪行为。

（2）鉴于我国短期内不可能彻底铲除滋生经济犯罪的社会“土壤”，现阶段不存在“以棒养廉”的经济条件，以及经济犯罪分子中有相当一部分不是“吃棒禄”的国家工作人员，有必要在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上确立“以严促廉”的刑事政策指导思想，设严刑峻法以昭天下，惩敢蹈之徒以儆效尤。

（3）制订各种法律、法规、政策和规章制度，应尽可能地考虑预防经济犯罪问题，不因法律、政策的漏洞给经济犯罪以可乘之机。立法创制应充分征求司法机关和工商、监察、审

计等行政执法部门的意见。

(4) 司法机关办理经济犯罪案件中，应注意研究各种经济犯罪的规律及其在各个时期的特点，通过办案及时发现法律、法规、政策和规章制度中的缺陷、漏洞，向各级党委、人大和政府报告，并随时向有关部门、行业通报。

(5) 立法创制的人大常委会、政府及有关部门，应有健全的机制来保障及时发现所订的法律、法规、政策和规章制度中的缺陷，随时听取有关部门提出的完善法律制度的建议，并通过适当的程序不断修改和补充法律制度，力避法律与制度长期滞后于社会需要的现象。

2. 有效的制裁经济犯罪体系。建立有效的制裁经济犯罪体系的总目标是：使经济犯罪行为能够被及时发现和侦破，依法受到应有的审判制裁。起码应包括以下六个方面：

(1) 群众举报各种经济犯罪行为的渠道畅通，查处和反馈查处情况及时。

(2) 司法机关经济罪案侦查人员具备较高的侦查素质，有一整套有效侦破各种经济犯罪案件、有效控制罪犯携款出逃及畏罪自杀的策略和方法。

(3) 与港、澳地区及有关国家建立必要的侦查合作和司法协助关系，以适应越来越多的国内外勾结从事经济犯罪活动和犯罪作案后潜逃境外、国外的新情况。

(4) 侦查组织机构和手段、经费、装备能够适应侦破经济犯罪案件的需要，从组织形式和物质技术条件上保障侦查经济犯罪案件的快速反应能力。

(5) 各地、各级司法机关的经济罪案侦查、检察、审判机构及有关行政执法、监察部门要有协调对付经济犯罪的意识，行政执法、监察部门对已构成经济犯罪的案件要迅速移送有管辖权的司法机关，以确保侦查、审理活动得以及时进行，不因“内耗”而让罪犯逃避制裁。

(6) 司法机关应根据一个时期经济犯罪数量的多少、社会危害程度大小，确定正确的刑事政策。当前似应着重解决与刑事政策有关的几个问题：其一，各司法机关制定系统内部的政策、规定，应在统一刑事政策指导思想的基础上，事先相互通气，解决好相互规定的平衡和衔接关系，避免各家在刑事诉讼的先后程序上出现对法律的理解不一致和对事实认定上的重大分歧。其二，做到对罪犯宽严适度，罚当其罪，以避免罪犯在改造期间因攀比而不服判决，抗拒改造。其三，鉴于对不少罪犯的经济犯罪事实不能全部查清，为不使罪犯在经济上占便宜，法院在具体适用刑罚时，应注重运用附加刑对罪犯处以罚金和没收财产，以剥夺罪犯“服刑两、三年，回家享受半辈子”的经济条件。其四，各地司法机关要注意克服囿于地方利益而产生的“地方保护主义”倾向，防止放纵罪犯逃避制裁。

在整个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发展时期，同经济犯罪现象作斗争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从中央到地方应把制定和实施有效的经济犯罪对策，作为国家和地方的经济与社会发展系统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把坚持人民民主专政的基本原则变成实实在在的行动和措施。只有这样提出和认识问题，才能确保掌握惩治经济犯罪的主动权，最大限度地减少经济犯罪的社会危害。

(作者单位：最高人民检察院理论组)

责任编辑：王敏远